



明州论坛

2月19日一早,中纪委网站发布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的消息,这是继2月18日傍晚宣布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后,又一名落马的高官(2月19日《法制晚报》)。

14小时内两名高官落马,显示了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贪腐的“老虎”不好打,贪腐的“苍蝇”更难查,相对“老虎”而言,“苍蝇”数量更多、藏匿得更深。这些贪腐的“苍蝇”藏在何处?日前,鄞州区人民法院对近五年审结的90件处级以下干部贪腐案件进行了分析整理,从中或可看出端倪。

90件案件中,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4人,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51人,10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10人,20万元以上的24人。这些人中,科级及以下的3人,副科级职务的11人,正科级职务的31人,副处级及以上的45人。县处级以下干部贪腐案件构成比例因素考虑进去(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绝对人数呈递减走势),这一正比关系则更为明显。

这些“苍蝇”贪腐呈现五大特点:一是“男多女少”的现象突出。涉案90人均均为男性。贪腐案件“重男轻女”,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社会关系网不如男性广,从事领导岗位的女性没有男性多,女性在与外界经济交往方面相对比男性更为谨慎等。另一方面是案件比较集中在建筑工程、规划审批、水利建设、电力供应等行业,这些行业中

男性从业人员的比例远大于女性。

二是“楼起人倒”为主要形式。90件案件中与建筑工程相关的有56件,占62.2%,涉及工程招标投标资格审查、违法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拆迁、工程承包、规划审批、材料采购、工程验收、消防安装等各个环节,表明工程建设仍是贪腐案件的高发区域。三是“副职犯罪”的比例较高。涉案的90人中,“副职”犯罪的比例明显高于“正职”。因“副职”一般受“正职”安排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分管范围内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决断权,更容易被行贿人“看中”。一旦“正职”监督不力,很容易酿成犯罪。

四是“涉农项目”成高发区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国家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快

速增长的“资金流”给流通环节管理人员和最后管理环节的“村官”拒腐防变能力带来考验。此类贪腐犯罪虽然涉案数额不大,但因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负面效果不容小觑。五是“窝案串案”的比例较大。90件案件中,有6件是一案数人的“窝案”,而在一些工程项目比较集中的区域和与建设工程相关的审批部门,“前腐后继”现象比较严重。如宁波某高校后勤管理处处长、处长助理在承建该校相关工程中共同受贿分赃,某度假区建设管理局四年之内连续有包括副局长在内的四名干部落马。

90件贪腐案件反映出不同的管理漏洞:一是对“人”的管理不到位。副职犯罪比例高、“串案”“窝案”比较多,反映出某些单位

对“人”的管理不到位,特别是放松了对单位副职这些“实权派”人物的管理。二是对“钱”的管理不科学。贪腐的高发领域,都是“钱”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涉农项目”贪腐案件多发,就是因为这几年国家惠农政策对农村的投入比较多。三是对“权”的管理不合理。贪腐现象无不是利用了权力运行机制的漏洞,90起案件表明,原料采购、物资供应、减免税收、财务管理、电力供应等“重点岗位”贪腐案件高发,反映出相关部门或岗位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这些“苍蝇”虽然官职不大,贪钱也不多,但他们的危害不亚于“老虎”,而且这些“苍蝇”就在群众身边,群众更加深恶痛绝,因此必须深挖严打,才能让反腐真正无漏洞、无禁区。

贪腐的“苍蝇”藏在何处

□郭敬波

公务员「肥不肥」要公开来给人看

□易其洋

2月10日,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人员收入“被公开”,绝大多数人工资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2月13日,《人民日报》“求证”栏目发表记者调查,证实多数数人实发工资确实在3000元上下,公务员的工资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

2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雪峰”的文章《关于公务员工资的10个问题》,主要观点是:公务员的工资10年没有涨,普遍比较低;公务员热之所以高烧不退,跟公务员工资关系不大,主要是就业难;这几年,不仅单位的高福利没有了,送卡的现象也在得到遏制;普通公务员也是腐败的受害者,不能让他们为腐败分子背黑锅。

工资单曝光了,媒体证实了,有公务员现身说法了,公务员这个行当“并不肥”。按理说,公众该相信了。但在网上,好些人表示“打死也不相信”。主要原因应该是两个:一是见多了有些贪官动辄拿几百万上千万甚至数百万元,见多了“表哥”、“房叔”、“许三多”什么的,见多了有些公务员来钱容易、生活奢侈,以为公务员都是“一样一样的”。二是认为公务员就算工资不高,但还有隐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还有养老、医疗、分房等高福利,照样是“油水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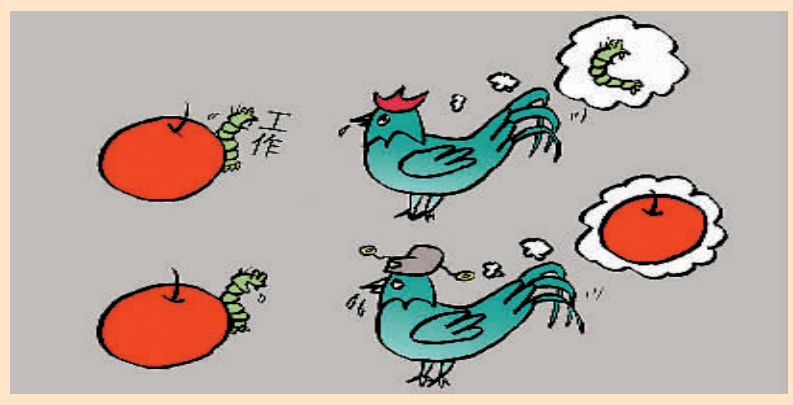
民众的“不相信”不是没有理由,一些公务员的“不承认”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这样的争论,因为信息不透明、不充分,只会变成“鸡同鸭讲”。也就是说,公务员到底拿多少工资、有哪些福利以及隐性收入等,公众并不真正了解,加上耳闻目睹了不少“乱相”,只好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这让许多公务员“很受伤”。

其实,别说是和滥权贪腐者相比,地区不同、行业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甚至是同一单位的不同科室,公务员的收入也是千差万别。说有些人“富得流油”不假,说有些人“穷得可怜”也是真的。正是由于信息“暗箱”,不但公务员之间的“收入鸿沟”无法填平,“分配不公”难以消除,也“坐实”了这一行是“轻松自在拿钱多”的社会印象。

有公开才有真相,有真相才有理解。正风肃纪,逼得公务员收入问题“白热化”。要搞清楚,“各说各的”不行,最终只能靠公开。就算像有些专家说的,普通公务员的收入是隐私,不能公开,那么公开一定级别官员的收入,实际上等于公开了所有公务员的收入。这样,一来可以消除误解。公务员也有过好日子的权利,如果真是收入太低,民众就没理由反对为他们加工资;公务员之间,别人如果干得多,那就应该拿得多,没啥好攀比和抱怨的。二是可以消除谈判。如果公务员收入真没公众想得那么高,许多大学生找工作可能就会另寻出路。当然,最主要的是,信息公开有利于达成社会共识,为解决棘手问题打下“理性对话”的基础。

眼随心到

何青云 绘



“人在证途”的困况应该消除

□殷国安

2月19日,在广州市政协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委员曹志伟现场展开一列长3.8米的“人在证途”长卷,标明个人一生常见办证就超百个,市民办证繁冗不易。他吐槽说中国人一辈子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证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证出多门”。每一种证,都来自一种行政审批项目,都代表了一种权力对群众的特许。从理论上说,制作颁发每一种证的初衷都是把证作为服务工具,保障群众享受相关权利。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异化:每一种证都是对群众的一种限制。为了管理,政府各个部门想办法设置门槛,于是证越来越多。不仅有依法设置的证,更有权力所有者随心所欲设置的证,例如河北省成安县就曾要求农民办理秸秆粉碎证、秸秆准运证。

证太多,至少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群众办证时的麻烦多,为办证,很多人是腿跑断,鞋跑烂;二是领证时的费用多,办证并不只收工本费,有的收费是成本的几十倍;三是群众保管使用困难,一大堆证,丢了一

个就不好办事,而补办新办还要难。这或许正是“办证”小广告泛滥的原因:群众无证路难行,真的没有,假的也行。

为改变“人在证途”的困况,曹志伟希望逐步实现“一证行天下”。我以为,“一证行天下”短期内可能做不到,但砍掉一大半还是可以的。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证会自然失去作用。比如,大家都能就业了,也就不需要下岗证、就业优待证了。二是,实行“一证多能”。比如,有了居民身份证,什么居住证、居住证、老年证、退休证、乘车优惠证、公园优惠证都可以取缔。三是,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不仅各部门的办事窗口可以合并,需办的证件也可以合并。

当然,减少各类证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国家层面统一安排,但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我做起,能不办的证件就尽量不办,方便群众生活。正如广州市委书记王庆良所表示:“地方能解决的,将由地方解决。”只有这样,上下齐心,逐项推进,“人在证途”的尴尬才会不再。

“一元药方”提醒加强处方监督

□徐娟

近日,江苏省盐城滨海论坛上,一家民营医院74岁的老医生季云天给病人开一元药方的帖子引来网友关注,大家纷纷点赞。从医40多年来,季云天给病人开低价药方是常事,“因为都是对症下药,开多了也没用,还会增加病人负担”(2月20日《现代快报》)。

在“大处方”司空见惯的当下,季云天的“一元药方”显得珍贵。为何检查用药一大堆看起来“正常”,而按需给药反成“另类”?有人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的沦丧,

有人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上找原因。笔者认为,一个直接原因是,目前对医生处方的监管存在缺失。

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法国医师协会对所有医生的处方进行电脑监控,开药金额排在前5%的大夫,每张处方都要被分析,只要发现一张处方有问题,这个医生就要“交代”为什么这样用药?说不出道理或解释不能成立的,将面临多重处罚,轻者掏钱赔偿患者,重者吊销医师执照。反观我们的医院,好像从没听

说有医生因为开了“大处方”而受罚,或被吊销医师执照。在一些医院,院方甚至通过提成、奖励等措施变相鼓励医生开“大处方”。对“大处方”的监管没跟上、处罚不到位,医生“灰色收入”与其开药拿“回扣”的关系就难以断绝,解决老百姓“看病贵”更是一句空话。

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不仅需要政府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护航。这就要求在医改过程中,从法律和政策的层面,建立保护“小处方”的制度机制,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彻底切断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促进合理用药、科学施治。

甬剧《筑梦》:展现宁波帮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王路

主创阵容堪称“惊艳”

甬剧《筑梦》主创阵容堪称“惊艳”,导演为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特殊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的陈薪伊。陈薪伊从事舞台剧创作近60年,创作了舞台剧作品近100部,还涉足话剧、京剧、闽剧、黄梅戏、粤剧、淮剧、沪剧、越剧以及儿童剧和音乐剧等各个领域,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及中国戏剧节、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中国京剧节等各类戏剧奖项无数。该剧副导演由曾参与《宁波大哥》、《安娜》导演工作的我市青年导演王红刚担任。

《筑梦》剧本则由我市国家一级青年编剧王晓青和国家一级编剧、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编导室主任王俭联合编剧。此前,两人曾合作了音乐剧《告诉海》,并一举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本剧创作过程中,二人多次赴武汉、宁波两地采风,将“宁波帮”精神充分融入了作品中。

甬剧《筑梦》还集合了目前国内的一批新锐主创人员,如来自北京的舞美设计常疆,服装和化妆造型设计丁丁,来自日本的作曲家刘一,来自武汉的舞蹈家姚晓明以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灯光设计周正平,唱腔设计由甬剧团的戴斌、汪锋担纲。

甬剧《筑梦》主演“沈三江”由甬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郑健饰演,他主演过《半把剪刀》、《宁波大哥》等多部剧目,梅花奖得主王锦文将饰演该剧女主角“姚梦欣”,虞杰和严耀忠分别饰演“林鸣涛”、“沈阿根”。

据了解,该剧首演结束后将于3月7日开始在白云实验剧场连演十场,启动为期两个月的大市巡演,并于5月份赴北京演出。

以文化为根基 唤醒稀缺的人文精神

——访著名导演陈薪伊

今年已经76岁的陈薪伊导演对甬剧《筑梦》倾注了非凡的热情,她为了执导好该剧频繁穿梭于大江南北,春节期间也不休息,住在宁波亲自指导示范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薪伊导演说:“我当时一看到《筑梦》的剧本,沈三江这个人物就立刻打动了我,我认为一出好的戏剧就该把人物摆在艺术的殿堂上。我的艺术理念是要把戏剧等同于学堂,等同于大雄宝殿,把伟大、崇高、神圣传递给观众。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文化相对沉沦。《筑梦》这部戏剧可以以文化为根基,通过崭新的舞台表现手法,唤醒如今已经稀缺的人文精神。”

陈导告诉记者,她的一个创作习惯是每出一出新戏都会去实地考察学习,当时在武汉看到沈祝三遗留的建筑时,震惊不已。她说:“我没想到宁波商人创下了如此丰功伟绩,可以说宁波商人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无与伦

比的作用。在这部剧中,我不仅仅想表达宁波帮在经济上的贡献,更想借此表达我对人伦的见解,中国现在稀缺的是传统文化精神,甚至出现了分不清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极端现象,我希望通过《筑梦》,再现宁波帮大气磅礴的建设国家的精神。”

记者了解到,《筑梦》以甬剧一独特的地方戏曲为表现方法,陈导给予了很多创新。如甬剧原本唱腔比较硬、快,难以表现重大题材,陈导一方面引入了类似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展现主人公威风凛凛的一面,让甬剧更好听更唯美,实现“真听、真看、真感觉”的艺术价值。同时,又在配乐上引入了众多西洋乐器,仅小提琴手就有8个,让声乐“高端大方上档次”。此外,该剧舞台风格、服装设计也很“洋气”,因为剧中的主角毕业于剑桥大学,一开口就是一股“英伦范儿”,不仅在舞台上说英语,而且动作举止非常欧化,服装是西装领带或洋裙高跟鞋。

(记者 王路)

韩寒团队马年首次“登陆”书城

本报讯(记者南华 通讯员肖锋)2月23日下午1点,著名青年作家韩寒创作团队7人将在宁波书城为广大韩迷签售新书。这次前来签售的分别是执行主编小饭、90后新锐美少女作家张晓晗、作家芥麦、青春文学作家滕洋、陈湛和编辑COCO、赵西栋,他们携带来的新书是《一个:很高兴见到你》、《去你家玩好吗》、《女王乔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等。

王蒙谈《红楼梦》:研读六十载 至今仍有惑

新华社三亚2月20日电(记者郭信峰)正在海南参加2014年两岸笔会活动的著名作家王蒙,日前来到中国最南端大学琼州学院,向现场千余名师生产解读《红楼梦》中的爱情、命运和人生价值,也提出自己关于这部著作的两处“不解”。

“有关《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续写的,我现在也不理解。”著名作家王蒙谈起自己研究了60多年的这部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时,感情依然执着。他认为,关于后四十回不是曹

雪芹写的,虽然研究非常充分、理据俱全,但还是让人无法接受。“我想,一部书写完之后,任何人都很难续写,尤其过了几十年之后再续写。”

另一处让王蒙困惑的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细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就问她有玉无玉,及至知道林黛玉无玉,便摔玉大闹一场。“这个情节也有些让人纳闷,我读《红楼梦》这么多年,仍然做不出理想的解释。”王蒙今年已80岁高龄,他的文学生涯始

于1953年创作、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然而,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更让他痴迷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

“我看《红楼梦》时是十几岁,真正写文章评论的时候是在二十几岁。”王蒙说,之所以喜欢上《红楼梦》,是因为这部著作看了之后让人能够琢磨的东西比较多。

“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很多,但很多作品思想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命题。但红楼梦写得那么真实,对于一些问题又没有给出什么答案,所以百看不厌,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王蒙说。

针对时下“浅阅读”多、“深阅读”少的现状,王蒙认为,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一些好东西可能被丢掉,但自己并不是特别悲哀。“手机阅读等快速阅读代替了认真阅读,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索契冬奥会

中国男子冰壶队将争铜牌

队员徐晓明:我们不是天才

据新华社索契2月19日电(记者刘越 李嘉)一直带给我们惊喜的中国男子冰壶队在19日的半决赛中没有上演奇迹,不敌实力强劲的两届冬奥会冠军加拿大队,无缘决赛。中国小伙子将在21日与瑞典队展开铜牌争夺战,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已经创造了中国男子冰壶队在冬奥会上的历史。

相比在循环赛中以一分之差惜败加拿大队,中国队三垒徐晓明说:“对手很强,打过很多像这样高水平的比赛。我们一直想努力打败他们,但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我们还差一点,虽然有机会但没有战胜,我们也很遗憾。”

中国队的四垒刘锐在赛后说,在场上每一个球都要选择,每一个球都有难度。“打出来就好了,没有后悔的事情,一个球一个球地打就对了。可以说,我们今天尽力了。”

中国一垒选手臧嘉亮也表示,虽然没有进入决赛,但在这场比赛中运动员们竭尽全力,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水平都展现给大家了,毫无保留地去拼了。第一次参加奥运的“新兵”二垒巴德鑫说,毕竟第一次打奥运会半决赛,还是有些紧张。对于下一场对瑞典的铜牌争夺战,他表示,对手是哪个队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要利用剩下一天的时间来调整自己,打好下一场。

虽然没能“虎口拔牙”拿下加拿大队,但作为一支仅有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男队来说,能够走到今日,实属不易。但是如何能让中国冰壶水平再提高?徐晓明有他的看法。

“其实,我们并不是天才,我们只是中国很少一部分从事冰壶运动的人中比较好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如果我们的群众基础再大一些,选才面再广一些,中国就会涌现出像乒乓球项目一样有天赋的运动员。”徐晓明说。他还希望国家和地方能够加大对冰壶项目的投入,多兴建一些场馆,使更多的人能从事这项“冰上国际象棋”。

鄞州区展开地毯式文物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南华 通讯员朱素珍 陈绍波)新春伊始,鄞州区文管办对全区所有文保单位(点)进行地毯式安全大检查,至昨日检查工作已全面完成。

鄞州区现有各级文保单位及文物点400多处,除古建筑外,很多是分布于野外的桥梁、古墓、石刻等,检查工作人手不够,为此,在区文管办的统一指导下,全区有116位业余文保员参加了这次行动。大家对文物本体的安全情况、安全设施设置、火电油气管、周边环境等逐一进行检查,并对值班制度、预案演练、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联动等安全软件进行了强化,发现20余处问题,主要是古建筑存在虫蛀、构件老化、漏水发霉等现象,田野文物主要是风化问题,一批灭火设备需更换。文管办工作人员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汇总后,及时进行了修补登记和更换设备的工作。